

第一章 科尔伯格计划的介绍

四个道德两难故事

劳伦斯·科尔伯格 Lawrence Kohlberg 认为道德成熟的标志是道德推理。因此，他对处于道德困境中的人们如何推理感兴趣。他指出 所有的人都是道德哲学家 那些研究道德的社会科学家也应如此理解。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他研究道德的方式集中在个体道德推理的普遍特征上。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当科尔伯格开始他的研究时 美国的心理学界的观念要么是朴素守旧的 要么就是超前的。几年之后才掀起了“ 认知革命 ”。

科尔伯格向他的被试讲述了以下的情景：

海因兹两难故事

欧洲有个妇女患了一种特殊的癌症，生命垂危。医生认为只有一种药能救她，就是本镇一个药剂师最近发明的镭。药剂师制造这种药要花很多钱，而他索价还要

高出成本 10 倍。药剂师花了 400 美元制造镭 而一小剂药他竟索价 4000 美元。病妇的丈夫海因兹到处借钱，试过各种合法手段，但他一共才借到 2 000 美元 只够药费的一半。海因兹不得已 只好告诉药剂师 说他的妻子快要死了，请求药剂师便宜一点卖给他，或允许他赊账。但药剂师说：“不行 我发明这种药就是为了赚钱。”这样 海因兹试过了一切合法手段 但他都失败了。于是他撬开药店的门，为他妻子偷来了药。

在这种情况下，海因兹去偷药——尽管是违法的——在道德上是允许的吗？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偷盗将得到道德的许可，那么海因兹是否有必须偷药的责任呢？如果快要死的妇女不是他的妻子，他还有这样的责任吗？等等。

在科尔伯格的八个标准的两难故事中，海因兹两难故事得到了人们最广泛的讨论。科尔伯格使用道德两难故事有其特殊的目的。他想从中引出他及其同事所做研究中与他们访谈的人的道德推理。他认为，在个体所做的道德判断的基本推理中 也就是说在他的道德哲学中 我们可以确定他的道德发展进程。人们解释自己的道德判断所用的基本结构预示着道德成熟。

科尔伯格两难故事对科尔伯格研究的方法论和评价是很重要的。因此在介绍科尔伯格的理论时 我将会使用道德两难故事。在此，我以简短地形式补充自己创造的其他三个两难故事。在本书的讨论过程中，我将会时时谈到这三个两难故事和海因兹两难故事。我把这三个两难故事称为：贫困儿童两难故事、随便性接触两难故事、赡养父母两难故事。

贫困儿童两难故事

当贝弗莉还在本地的一所大学读书时，她已经和斯蒂芬结婚了。这是 6 年前他们 21 岁时。现在，斯蒂芬在附近的一家工厂工作，贝弗莉做兼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为还清贝弗莉的上学贷款和存钱预付房子的订金，他们两人精打细算，努力工作。贝弗莉是他们镇上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办公室主任。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 5 岁，一个 1 岁，还有一个 3 岁的儿子。斯蒂芬的父母和贝弗莉的父母都会尽自己所能帮助和支持他们。

斯蒂芬和贝弗莉住在美国，他们信奉天主教。斯蒂芬认为他们不应该再生小孩了。如果想再要小孩，他认为他们应该收养其他的孩子。现在太多的孩子吃不上饭。斯蒂芬认为，当他们有能力照顾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时，却还要生自己的孩子，那岂不是很不负责任吗？贝弗莉也觉得有很多孩子需要帮助。然而，他们两人的努力又能起多大作用呢？1992 年，仅以美国为例，6 岁以下的儿童总共大约有 6 百万人，而其中就有 26% 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过去二十多年儿童贫困人数迅速增长的结果。比起 1972 年的 340 万要高得多（Child Poverty News Issues, Winter 1995, Vol.5, No.1; 1992 年的贫困线：四口之家的年收入是 14 335 美元，三口之家的年收入为 11 186 美元，两口之家的年收入为 9 137 美元）。据保护儿童基金会估计，1995 年 6 月的资料显示，在美国每天

有 2 699 名婴儿一出生就陷入贫困之中，大约占有所有出生婴儿的 24.2%。他们的处境很悲惨。每年有 98.5 万个婴儿一出生就陷入贫困中，大约是 4 个里就有 1 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贝弗莉不希望他们节育或是收养别的孩子。她想有自己的一个大家庭，就如她成长的家一样。斯蒂芬认为他们不应该再生自己的孩子了。他想至少要收养一个孩子，就如他的养父母收养他一样。

随便性接触两难故事

几周以来，瑞娜 (Reanna)一直在和朱莉 (Julie)谈论自己喜欢的布拉德 (Brad)。瑞娜的朋友仅仅从布拉德的兄弟那里了解到他吸引瑞娜的一些好的方面，所以他们都认为布拉德是个可爱的人。因此，当朱莉看到瑞娜和布拉德在周末的大学生联谊会上谈话时，她感到很开心。但是 第二天瑞娜向朱莉讲的故事 又令她非常烦恼。

表面看来，聚会上布拉德邀请瑞娜到楼上的房间。瑞娜跟他一起去了。瑞娜对与布拉德发生亲密关系感兴趣，就像布拉德看来对此感兴趣一样。触摸和接吻代替了交谈。但是事情发生了变化 当时 布拉德的三个联谊会兄弟在卫生间突然大笑起来。他们一直在那儿。瑞娜惶恐地出来，并且明白，布拉德早知道他们已经在那儿。他们事先没有告诉瑞娜。在瑞娜穿上衬衣出门之前，她听到的谈话表明 虽然布拉德还没有“完成”但是他已经达到了兄弟们对他考验的最后阶段 因为 是兄弟们的过错导致他不能完成。

朱莉以前看到过这种事情发生，她认为瑞娜应该对布拉德和他三个朋友提出性骚扰的正式控告。瑞娜很生气，但主要是希望破灭和受到伤害。

赡养父母两难故事

威拉德和杰尔一起努力工作维持家庭。10年前威拉德被解雇原因是他所为之工作18年之久的制造企业裁减中层管理人员。他必须重新开始事业，但是作为美国东南部地区销售负责人，他到现在还没有获得薪水和监督权力。这对于家庭来说，压力相当大。威拉德感到被出卖和欺骗。杰尔和威拉德离开学校不久，杰尔就开始了自己的房地产生意。他成功地为14个全职或兼职的代理商和股东建立了代理机构。他在威拉德寻找工作之时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自从那时情况就已经变得糟糕。尽管如此，在大部分周末和假期，他仍得工作。

现在，有另外的压力。威拉德的母亲塔莉萨住在离他们两小时路程的地方，她越来越依赖威拉德。她和威拉德的父亲沃伦为退休后的生活积攒了足够的钱，但是，他们没有料到沃伦的病花了他们太多的积蓄。最后沃伦还是病去了。保险虽然承担了大多数的医疗费用，但却不是全部。还有一些类似旅馆费用的附带费用，因为塔莉萨搬到医院附近，以使专家在那里能延长沃伦的寿命。塔莉萨能担负她的小房屋的费用，那里是威拉德和姐姐（已死）成长的地方。但是，如果她继续保留这个房屋，她将不能担负起雇佣一个管家和一个护理员的费用，她越来越觉得没有这两者，她不能做任何事。

杰尔和塔莉萨从来和睦相处。如果让塔莉萨搬到他们家来住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是在塔莉萨摔倒并受伤之前。如果塔莉萨没有同他们住在一起，护理照顾和管家服务是必要的。私人护理是非常恰当的，但这增加了维持家庭的费用，将比她在临近市郊的疗养院里生活花费更多。但是，塔莉萨很明确地拒绝考虑进入“疗养院”她记得她的祖母和她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狭促的、发臭的地方去世的。

在这四种情况中，每一种处境所牵涉的人都处于一种绝境，不清楚应该做什么。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人们关于下一步应该发生什么，以及在这些情况下，大多数人应该做什么，自身感到很矛盾。

海因兹能考虑到种种理由来赞成和反对偷药，尽管他不能确定这药是否能救他妻子的命，甚至是暂时的，他不知道还能做其他的什么事。海因兹感觉到药剂师是吝啬的、没有理由可言的，特别是在这样的处境下。但是，药剂师并不为她妻子自身所处的情形负责。

贝弗莉和斯蒂芬深深地置于冲突的家庭计划中。但是，每个人也都相互尽忠，对他们的婚姻尽忠，以致坚信应该以某种方式尊重其他人的计划。斯蒂芬认为他们应该关心已出生的和遭受痛苦的贫困孩子。但是，贝弗莉认为收养一个孩子对解决全世界大多数人的贫困来说，只做出了非常微小的贡献，但对她来说却要做出很大的牺牲，她认为自己没有责任这样做。

瑞娜想要布拉德承认这是错误的，即他只是把她看成在

他自己游戏中使用的一件东西。瑞娜是受伤害的和尴尬的，虽然她不想拖延时间。朱莉非常清楚地知道提出控告他的性骚扰所具有的难度。对于瑞娜来说，朱莉也仅仅想让这成为过去。

杰尔痛恨塔莉萨总是把他看做威拉德生活的附带和可排除的部分，但是，他认为如果塔莉萨能搬来和他们一起住，威拉德的境况会更好。威拉德不知道，如何才能很好地处理这件事，因为这将增加家庭的压力，但是，他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对他更母亲公平的方法。塔莉萨意识到，搬来与威拉德和杰尔一起住，对于所有人都是困难的，但是，她认为她再也负担不起了，她不想成为威拉德的一个经济负担，增加他对失业的焦虑。

学者们普遍认同科尔伯格这个理论，即我们对这些情境进行的推理是在我们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芝加哥大学做的学位论文中，科尔伯格 1958 阐述了对 6 个阶段发展的解释，所有人的道德推理都是通过这 6 个阶段从童年到成年发展的，无论其文化如何。他把阶段确定为 6 种明确地思考方式，即思考人们面对有疑问的两难问题时需要何种道德哲学。科尔伯格花费三十多年的时间和精力来提炼和确证他最初研究的革命性的发现。

20 世纪 70 年代，科尔伯格的阶段理论获得巨大成功，在发展心理学的许多教科书中把他的理论描述为是对道德发展的最好、甚至是惟一可信赖的解释。但是，20 世纪 80 年代，他的理论在学院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那里失去了大部分的支持。在学院哲学家那里遭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许多人认为，这个理论已经重蹈其他不恰当的科学范式的覆辙。它已

经过时了，它在科学或哲学上不再可行。

我的修正主义说明

在认为这些批评是正确的印象下，我写出了长篇论文。我注意到科尔伯格认为苏格拉底对话是一种道德教育方法，我特别着眼于他偏爱柏拉图《曼诺》和其他早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的教育方法而非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的教育建议。我坚持认为，柏拉图想要展示给我们某些科尔伯格还没有意识到的有关苏格拉底辩证法的不确切性。但是，当我更多地考察科尔伯格自己的教育干预时，我改变了我的想法。事实上，科尔伯格已经意识到了柏拉图想要表明的关于教育的社会和政治品质的重要性。他只是还没有承认——也许因为自身没有重视——对于他理解道德发展来说，这种意识是需要的。他没有承认他自己的研究方式反映了柏拉图本人从早期对话到《理想国》的发展。

我写本书，是为了叙述一个修正主义故事。有两个原因说它是修正主义的 第一 我提出对科尔伯格研究计划发展的普遍理解 我本人也具有这种理解 进行修正 第二 我建议对全部计划实际上关于什么，以及因此如何更充分地发展它的解释进行修正。

我能如下陈述我修正主义故事的四个主要主题：(1)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阐述和发表了对科尔伯格计划提出的最著名和明显最有破坏性的批评时，他们不再提出这个计划的核心原则。这个计划已经改变了。但是，(2)科尔伯

格在对批评的反应中，从没有指出这点，因为，他本人从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点。(3)他从 1968 年到生命的最后，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关注他的最知名的批评中从没有提出的民主改革计划。这个改革民主团体实践的计划为完成他更大的计划目标提供了最大的希望——以一种社会多元文化的方式思考公正，并公正行事，这种方式仍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是与历史无关的、跨文化的不道德。但是，(4)科尔伯格继续以道德发展的结构阶段模型的术语来理解他更大计划的目标。这是他计划的理论成分，是对他的最著名的批评。然而，那些目标本应该用他花费半生所研究的民主革新的术语来更好阐述。遵照科尔伯格，我称此为道德教育的公正团体模型。它是一个被认为在多元文化和跨文化社会中的民主团体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

科尔伯格是怎么没有意识到他的研究前途的呢？让我初步提出涉及第二个主题的解释的两个部分。第一，科尔伯格个人坚决要把更大的研究计划向前移动到多元的前沿——资料搜集、评分修正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监狱改革和学校改革、对假设的阶段 7 的哲学和宇宙论的思考，等等。他也坚决想要把批评融入他有关计划的研究中去，他自己把批评带进其研究小组的讨论和争论，想要把它们融入进去。事实上，与其说他想要在更大计划的各种理论成分中保持概念的一致性，不如说他想要合并批评，并拓展他的更大计划的范围。激烈的紧张关系使科尔伯格和他的研究小组不断地处于发展中。科尔伯格没有疏忽作为一个整体计划的概念一致性，但是，这不是他主要的贡献。个人的、专业的和理论上的严谨不是科尔伯格最好的优先权。一位同事反映，如果要选派的核

心角色为一位凌乱的、心不在焉的教授，那么他们将选派科尔伯格。也许，科尔伯格认为，全面的概念一致性能暂缓一下，或者其他东西最终会清清楚楚。毫无例外，科尔伯格最优先考虑的事是扩展他的思考公正和履行公正的计划的范围。

这个解释的第二个部分与第一个有关。1972年1月科尔伯格在去中美洲搜集跨文化资料的过程中，染上了一种病（*Giardia lamblia*）。在那次旅程中，科尔伯格没有准备好为饮水消毒。他也忽略了进行及时的医疗检查，不知何故，原动物寄居在他的肠内。他接受的避开原动物侵袭的药物治疗使他作呕、发烧和不高兴，有时无判断力，甚至偶然出现幻想。他的心理连贯性有时偶尔遭破坏，在当时状况多少有些扩大的期间，即使很简单的事也无法做。

我特意提及“科尔伯格的计划”而非一般确认的那个计划的阶段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初，科尔伯格把他的研究用于监狱和学校改革计划中，在许多方面，他们需要的可能是一种更多样化的道德心理学，而非他曾经重视的许多批评。我想要提出，科尔伯格本人也许从没有完全重视这点。他继续根据对批评家构成挑战的道德发展结构阶段模型的理解来维护它。他保持了这个计划的各种成分，好像它们同样是必备的。我认为原因是，科尔伯格本人没有重视这些方面，即他民主团体实践的研究已经开始超越了道德发展结构阶段模型的心理理论的不适切性，这是批评家确定的不适切性（主题4）。科尔伯格在结构阶段模型和公正团体模型中陷入僵局，我认为，他从没有完全解决这点。

因此，简而言之，我叙述了一个科尔伯格计划发展的故事，对科尔伯格计划的批评已经被大部分修正了。然而，根据

我的叙述 批评家的成功是十分有限的。因为 他们已经成功限制了计划的理论设备成分的范围，这个计划本身对发展更大计划是无关紧要的。结构阶段模型继续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 它使科尔伯格成名 在名声的基础上 科尔伯格获得了研究生和博士后助手，并且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获得了进行民主改革计划的经费。但是，除了这个事实外 许多科尔伯格派的人 包括科尔伯格本人 都明显认为更大计划的成功需要继续依靠结构阶段模型的成功，阶段理论已经不再受人关注。

柏拉图和科尔伯格

我把柏拉图引入这个故事中，是为了理解看来相当奇怪的建议，即遵照与柏拉图在两个关键方面相似的科尔伯格的早期发展 将会清楚揭示这个计划 科尔伯格把接下来的、国际范围的东西吸引到这个计划中，也会帮助我们理解他本人如何预想这点，即注意结构阶段模型极其不规则的问题来提高他的计划。这将使我们遵循科尔伯格和柏拉图，向着公正的社会建构的概念发展。科尔伯格花费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来提高道德发展的观念，将其作为个体对公正原则的理性建构（重构），但是 科尔伯格也通过民主团体的实践 形成了公正的社会建构的概念。柏拉图已经在与科尔伯格相同的处境中，达到了公正团体解释的非民主的副本。

在科尔伯格的研究生涯中，他对他那个时代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道德相对论进行挑战，并且介绍了社会公正问题

的民主理论 从他的观点来看 正是因为这两种要素——非相对论和民主——是对纳粹主义做出适切反应所必需的。科尔伯格直接遭遇了纳粹主义的影响。当他 18 岁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欧洲的美国商船上工作。 19 岁时 科尔伯格利用他的新技术在帕多卡号上当副机械师，这是一艘犹太抵抗力量用来从欧洲偷运犹太难民通过英国封锁线到巴勒斯坦的旧海军轮船。

1958 年在芝加哥完成论文后，科尔伯格已经全面地阐述了他的理论 即道德（公正）推理的 6 个跨文化普遍的发展阶段的不变序列。这个理论是一种对他在 20 世纪 40 年代大学之前遭遇到的不公正的深思熟虑的反应。因此，关于对科尔伯格计划的阐述，对他最有影响的东西，在他 31 岁时已经出现了。这非常符合柏拉图的情况。

柏拉图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之后不久出生的。这次战争把独立的希腊城邦的脆弱联盟分开了，这个联盟是为防止多年前波斯王国的入侵而形成的。这次战争使主要是雅典对应的民主主义者与主要是斯巴达对应的寡头政治执政者或贵族形成对抗。柏拉图 11 岁时，雅典人屠杀了爱琴海的一个小岛——米洛斯（Melos）上拒绝在战争中放弃中立的人。在他以后的十几年中，一直到二十多岁时 他目睹了民主雅典的逐渐衰败。他 23 岁时觉得蒙受了更深的耻辱，因为推翻了民主党人 建立了由 30 个寡头政治执政者组成的占统治地位的参议会 被民主党人称为“30 个暴君”。而且 最知名的是，28 岁时 柏拉图喜欢看一部市民戏剧 这部戏剧围绕苏格拉底被强加统治的民主党人合法处死。苏格拉底被带到法庭，被指控为腐蚀年轻人 并引入错误的神性。许多人都注意到 这些

是捏造的指控，是针对压制这个被某些人认为是具有寡头政治的哲学人物。柏拉图直接体验到了民主政体可能做出的错误判断和不公正。

作为一个和睦而富有的雅典家庭的儿子，柏拉图成长为一个悲剧诗人。他转向哲学戏剧，全身心地考察善和真实。贯穿于他的研究主题的是这个问题：是否可能真正了解善和现实，而非只是判断和想像。除了揭露传统观点和传统美德的缺点外 关于这方面 柏拉图的主要关注是用钻研的眼光来考察这样的观点，即最适宜地为善和现实的相对论辩护的论点。如果对相对论的赞成是可证实的 那么 为屠杀米洛斯岛人和处死苏格拉底的辩护也是可证实的。对于年轻的科尔伯格来说，被认为不足的辩护是由纽伦堡的纳粹战犯提供的。

对计划的历史纵览

科尔伯格完全按照自我意识，把他的计划建构为在政治和个人上有意义的。在对他计划的阐述中，他针对性地提出了在纳粹暴政中实际上制造的罪恶的可能性——在寄宿学校和大学之间体验到了这种暴政的影响。科尔伯格第一次出版的文章叙述了他在帕多卡（Paducah）号轮船上的经历 是在《门诺芮杂志 Menorah Journal》》上于 1948 年出版的。他取名为“香蕉之床”。这是出现在当地港口城市的法国报纸上的大字标题 在这之前 这家报纸的记者怀疑帕多卡号上塞在船的仓库中的木箱。船员声称他们正在拖运香蕉。报道声称他们正在偷运犹太难民。毫无疑问，这正是他们做的事。在原先

的港口，就曾有人问起不成比例的犹太船员的数量的问题。

科尔伯格的理论必须使他能阐述他认为的在大屠杀中，是与历史无关的、跨文化的不道德的东西。康德（科尔伯格认为其是芝加哥大学胡特肯斯学院的一名本科生）似乎为这样一种有意义的理论提供了框架。他发现，康德陈述了在由洛克（Locke）、杰斐逊（Jefferson）和 J.S. 穆勒（J.S. Mill）提出的普遍人类权利的竞争性理论中合理的潜在的原则。当一名研究生阐述了他的道德发展理论时，他已经吸引心理学家致力于康德的伦理形式主义（尤其是鲍德温和皮亚杰），当他继续完成他的理论时，他发现在当代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 分析道德哲学鼓舞人心地支持康德主义。

尽管科尔伯格最初是在学院心理学的专业领域中建构他的理论，但是，这只是他为开创这个理论而选择的途径。经过一个夏天他在精神病院的帮忙，他选择攻读临床心理学的研究生而非法律——他认为这两者都是使他能帮助人们的专业。他在精神病院实习的两年期间，体验到了许多的令人不安的事情，在此之后，他选择把专业转换到社会心理学，并做儿童道德推理的论文研究。在医院时有这样一段经历，一个被认为是妄想狂的病人，要求他反对专业人员，她说，他们想迫害她。主治精神病医师无意中听到她的抱怨，对她进行电击治疗。尽管科尔伯格对全体医生抗议，电击治疗只能对病人的妄想症有效，但是，他的抗议被驳斥，医生还是实施了这个治疗方法。

此外，在对学位论文中开始的研究计划进行理论阐述和实证证实的前十年期间，他的理论的实际意义变得越来越明显 比如 在他学生的研究中 尤其是特内尔（Turiel）、雷斯特

(Rest)和布拉特 Blatt 的研究中。为了促进他的计划 科尔伯格于 1968 年离开芝加哥心理系 (从 1962 年 他一直在那儿), 来到哈佛的教育研究院。1971 年、1974 年和 1978 年 他分别开始在康涅狄格的尼安提克 (Niantic 监狱、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雷吉拉丁中学 Cambridge Rindge and Latin High School)的克拉斯特学校 (Cluster School)、以及纽约市斯卡斯代尔的选择学校中进行示范的道德教育计划。

怀特 (Sheldon White), 科尔伯格在芝加哥和哈佛的同事, 他认为, 科尔伯格相信自己的理论只是被批评家所误解。科尔伯格已经谈到, 他将通过实践杜威所做 的事以及通过把自己的理论用于学校本身的实践中来现实引导他们。他从苏格拉底的对话转换到公正的社会建构, 正如柏拉图本人这样做一样。科尔伯格提出了一个计划, 这是否需要他加入与道德哲学家的元伦理学的争议中, 或者加入与发展心理学家的方法学的争议中, 或者加入与教育者和学校管理者的教育学和政治的争论中。是的 的确是这样 科尔伯格参加了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类型的讨论——尽管与学院的学术相反。

这就是问题变得复杂的所在。因为, 在作为一个整体的计划中 存在着基本的紧张关系 不管这个事实如何 即科尔伯格最初相信学校的研究只实现了他在阶段理论模型中阐述的东西。我认为 这个计划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改变了 (主题 1) 并且 结构阶段模型对于发展更大的计划越来越无关紧要。引导结构阶段模型的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的结构阶段模型以及新康德学派的元伦理学假设, 与这个计划的其他主要要素处于基本的紧张状态中: 学校道德教育中的公正团体模型 这个模型吸收了米德 (G.H. Mead) 的社会心理学、杜威的

教育理论和实践、以色列集体农庄的社会公正理想以及涂尔干(Durkheim) 的社会道德假设。正是在这个两种主要模型之间的紧张关系中, 我们既发现了解释科尔伯格计划摇摆的原因, 也发现了有关超越结构阶段模型的异常问题的计划所具有的特征。在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之前, 让我叙述一个相关论题。

在我叙述科尔伯格的真正故事中存在着不一致。我认为这与我刚才提出的不一致是相联系的。一方面, 科尔伯格的同事、家庭和朋友强烈地认为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 全身心地致力于他们的需要、幸福, 并在与他处于亲密关系的个人和同事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另一方面, 他对道德或公正的解释, 由于这种解释的公平和非个人化, 以及由于以这种解释为前提的声名狼藉的断开和分离, 而受到批评。我认为, 对这个不一致的最好解释是, 科尔伯格的道德、公正观念从没有打算解释他与同事、家庭和朋友关系的性质。这个观念只是打算解释保护那些关系和关系中所涉及的个人免于受到伤害或免受外界的破坏所需要的条件。也就是说, 科尔伯格想用公正概念来解释在纳粹大屠杀中, 以及其他所有违背人类尊严的事件中, 与历史无关的、跨文化的错误。基本的不公正湮没了人类。科尔伯格认为, 保持非相对的道德, 为依恋关系的可能性提供了条件。关怀伦理是以公正伦理为先决条件的, 因为, 只有后者才能确保前者的可能性。确保反对科尔伯格 18 岁时所经历事情的可能性, 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中确保它——确保反对相对论以及相对论为其留有空间的独裁主义的可能性。

也许, 正是这种对人类尊严的残忍、凶恶攻击的普遍和跨

文化的非相对本性的研究，解释了科尔伯格迷恋于康德的形式主义。也许，科尔伯格没有意识到，康德伦理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历史文化的表达。我们从康德和他的前辈继承而来的启蒙运动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这种信心，即我们可以对我们作为一个人或人们所具有的基本义务给出完全可理解的，然而在文化上中立的解释。对于我们来说，不可理解的是，任何文化或传统构成的团体怎样才能不具有这些义务（比如最大化自由和断绝权威的机会），这表现出一个关于他们与关于我们的同样缺少趣味的事实——这个事实指对于我们来说，作为启蒙运动的后继者，什么东西是可理解的。我们可以在这种形式主义中，以及康德给予的特殊形式中，发现科尔伯格思想的主要局限，以及在科尔伯格描写的道德理论中，发现康德传统的当代声音。当然，近来许多女权主义者对科尔伯格提出的批评正是指向这种形式主义。

我认为存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计划中的不一致，可以在理论资源中发现，科尔伯格最初在阐述他的计划时利用了这些资源。科尔伯格作为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在我所提到的第二次实习医师期间）在开始访谈研究之前（他学位论文的实证基础部分），花了一年来解读和考虑他的计划应该采取的形式。在论文的第二章中，科尔伯格回顾了道德发展的文献研究（Kohlberg, 1958）其中他论述了功利主义者比如休谟（Hume）、史密斯（Adam Smith）和西奇威克（Sidgwick）以及反功利主义者、反道德主义者尼尔斯克（Nietzsche）。他也用一部分论述了涂尔干以及用一部分论述了米德。第二章的最后三部分讨论了鲍德温和皮亚杰。涂尔干、米德、鲍德温和皮亚杰似乎在科尔伯格 1958 的陈述上具有连续性 即从更